

中文版序

當我收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邀請，將 *The Politics of Dating Apps* (MIT Press, 2021) 翻譯成中文時，我既感興奮，卻又憂慮。

興奮，是因為我的受訪者終於可以直接閱讀自身故事。我們傳播學者一貫慣於在國際學術期刊或海外大學出版社以英文發表研究，儘管我多年的工作都聚焦於以中文為母語的群體，成果卻全以英文發表，這本書也不例外。就算我曾在一個內地網上平台以中文訪談形式分享此書要點，訪談文章仍因種種原因被下架。這次英譯中的機會，正好讓我回饋受訪者，實在令人雀躍。

憂慮，是因為本書是基於2016至2018年收集的資料撰寫而成。在這近十年間，中國內地手機約會軟件產業改變了不少。一些我在書中提及的約會軟件已不復存在或改變了運營模式。例如，女同志約會軟件LESDO (樂Do) 在2020年被南城兄弟收購後，於2021年停止營運。男同志約會軟件龍頭Blued在2023年被赤子城科技收購，其海外版在2024年更名為HeeSay。與此同時，在我研究當年才剛剛

推出的 Soul，今天已成為內地異性戀市場上第三大的約會軟件。Soul 允許用戶使用虛擬頭像來塑造形象，還有小遊戲供大家娛樂，以趣味減少尷尬。在約會軟件生態改變下，我這本書還有價值嗎？

我的結論是：有。

雖然我的研究談及某幾個軟件的特定功能，但重心在於從約會軟件文化更廣泛地分析中國內地的性別和酷兒政治，而這些議題往往需要更長時間的討論，才能帶來顯著改變。當年研究記錄了中國女性如何在壓抑的社會環境下，透過新興約會軟件尋求性與情感自主；今天年輕女性同樣為了獲得自主而選擇投入於各種人工智能戀愛互動手機遊戲。此外，書中也提到中國同志面對社會的壓力，而這些壓力在過去十年來並沒有根本性的改善。如同性婚姻雖已在台灣、尼泊爾與泰國這些地區合法化，但在中國內地立法前景仍然渺茫。

因此，當讀者閱讀這本書時，大可注視於約會軟件文化和中國性別和酷兒政治的互為關係，而非僅僅著眼在哪個軟件、哪個功能。

當我開始著手研究中國約會軟件文化時，有關文獻並不多。我有幸作為早期研究者，能夠進行一些較有原創性的理論實驗。例如，我借用了漢學家雷金慶提出的中國「文武」男性氣概理論，探討中國直男在約會軟件中如何操演中國獨特的男性氣質。在討論男同志使用約會軟件的章節，我把情感理論置於中國特有的同志情境之中。

但坦白說，這本書仍有眾多我認為極之重要卻未能涵蓋的議題。這包括跨性別人士使用約會軟件的障礙和挑戰、華人在跨國情境下使用約會軟件的情況，以及中國城鄉之間的階級差異等等。

對於華人在跨國情境下使用約會軟件的分析，我極力推薦李海莉 (Haili Li；音譯) 於 2020 年在《國際文化研究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上發表的文章〈熱拉上的跨國團結：中國酷兒女性的家園紐帶建構〉(“Transnational Togetherness Through Rela: Chinese Queer Women’s Practices for Maintaining Ties with the Homeland”)。李海莉的研究聚焦於澳洲華裔酷兒女性，探討她們如何利用社交媒體來發展和維持跨國親密關係。熱拉 (Rela；推出時原名為 The L，後更名為熱拉，如今已恢復原名) 是一款多功能約會軟件，不僅允許用戶瀏覽他人的個人檔案和發送信息，還提供直播和群組聊天功能。文中一位受訪者分享，她與一位經常觀看同一主播的觀眾成為了好友。對於那些伴侶住在中國、需要維持異地戀的人來說，共同觀看直播成為了她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位受訪者表示，她與伴侶每晚都會談談當日的直播內容。此外，熱拉的聊天群組也成為這些居住在澳洲的華人酷兒女性獲得中國最新新聞和資訊的重要渠道。透過熱拉建立的聯繫雖令人滿意，卻也減少了她們與澳洲本地酷兒女性互動的需要，逐漸令她們與當地酷兒社群疏遠。

關於中國城鄉差異和約會軟件文化，劉亭亭及其研究團隊於2022年在《信息、通信與社會》(*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發表的〈數碼戀愛的殘酷樂觀主義：華南農民工的心碎網上情緣〉(“The Cruel Optimism of Digital Dating: Heart-Breaking Mobile Romance Amo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是必讀之選。該研究團隊訪問了東莞和深圳六十多名農民工。儘管約會軟件陌陌強調「總有新奇在身邊」，研究質疑實際上有多少用戶能真正與身邊的新奇人事建立關係。運用文化理論學者貝蘭 (Lauren Berlant) 所提出的「殘酷樂觀主義」概念，劉亭亭研究團隊指出女性農民工抱有在約會軟件上遇到「高富帥」對象的憧憬，然而這些期望在物質主義盛行的現實

中往往很容易破滅。例如，一名受訪者曾認識一位外表吸引的男士，但該男士作為工地負責人，其經濟狀況並不穩定，更在2016年經濟衰退時陷入財政困境。經親友勸告，受訪者最終與該名男士分手。此外，研究也記錄了男性農民工在使用約會軟件時面臨的階級限制，如會被女士問及是否擁有房產或其年收入情況。總之，該研究指出，儘管約會軟件給予農民工希望，但在追求高度物質化的浪漫過程中，這些希望往往成為泡影。

至於內地跨性別人士使用約會軟件的情況，正式研究相對稀缺。某些文章或許輕輕提及過一、兩名跨性別人士。跨性別人士在使用約會軟件時面臨一個核心問題：該何時透露自己的跨性別身分？過早可能會導致潛在感情關係提早結束，但太晚的話又有機會被對方指控隱瞞身分。目前這方面研究較少，希望未來學者能夠深入探討。

若將約會軟件文化置於中國國情，除了本書討論的性別和酷兒政治外，還可探索跨國流動、階級等議題。我們也可以通過研究約會軟件揭示社會對少數族裔、殘疾人士的刻板印象。撰寫這本書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公眾對約會軟件的討論不僅限於約炮上——約會軟件實際可以反映出社會上各種意識形態和權力分配。

從我開始這項研究到今天中譯本的發行之間，約會軟件研究主題已變得更多樣化，研究倫理的討論也有了顯著擴展。十年前，當學者研究約會軟件時，常將其視作一個公共空間——類似於公園。在這樣的公共空間，學者可以自由觀察並記錄。在進行這項研究時，我也採取了相似態度，在異性戀和男同志約會軟件上設置了帳戶，以便觀察用戶行為（女同志軟件明文禁止男性開設帳戶，所以我並未在上面註冊）。在附錄部分，我詳細說明了在軟件上如何招募受訪者。簡單來說，我開設了一個研究專用的帳戶，一方面被動地等

待對我研究感興趣的人與我聯繫，另一方面我主動向在軟件上見到的人發出一個極簡短的研究邀請。為避免騷擾用戶，我並沒有再發任何提示訊息。

經過多年與用戶及研究同儕的討論，如果我有機會重新進行這項研究，我不會在約會軟件上直接招募受訪者。今天的學術界認為，雖然約會軟件向所有人開放，但用戶之間存在一個共識——即其他使用者都是以交友為目的。作為研究人員，在軟件上尋找受訪者便違背這一共識。就如當我們在約會軟件上本以為對方是尋找關係（無論是浪漫關係還是短暫關係），最終發現對方是在銷售保險、美容或健身套餐時，我們都會感到煩惱或失望。事實上，有些約會軟件的條款中明確禁止研究人員在他們平台上進行研究活動。在過去幾年，我和我的學生都避免在約會軟件直接以帳戶形式招募研究對象。

本書的英文版在內地得到同志學術界討論。我衷心感謝所有參與討論的朋友們，尤其是兩位主動聯繫我並向我指出原著中一些錯誤的人士。就著這錯誤，我已經立即修改英文電子版。我也加倍留意，確保本書不再出現同樣錯誤。

最後，我非常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林驍編輯和陳沅宜編輯，她們的專業、效率和細心幫助我完成了這中譯本的出版。我也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和我共事五年的同事、朋友和導師們。他們給我的意見和指導，我將永記於心。

陳力深

2025年2月

寫在澳洲依奧拉族朶迪蓋爾人之地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致謝

我對約會軟件的興趣始於2010年代初，當時我自己就是個活躍用戶。但在那個年代，使用約會軟件仍被視為禁忌。朋友常流露出擔憂（「你不怕被殺嗎？」）、憐憫（「親愛的，你才不需要靠這個來物色伴侶吧！」），有時甚至是嘲諷（「你肯定一直都很性奮吧！」）。到現在，差不多十年過去，情況並未真正改變。研究與寫作本書，或許是我為約會軟件以及像我這樣的用戶爭取社會認同的一種方式。

這本書的構想始於2015年，當時我正在南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計劃以此作為我博士論文的題目。從計劃初期開始，我的論文導師拉瑞·格羅斯（Larry Gross）便給予了我無條件的慷慨支持。我非常感激南加州大學各位老師對我的教導，包括邁克·阿南尼（Mike Ananny）、曼紐·卡斯提爾（Manuel Castells）、克莉絲蒂娜·鄧巴—海斯特（Christina Dunbar-Hester）、安吉—瑪麗·漢考克（Ange-Marie Hancock）、凱蒂·哈森（Katie Hasson）、洪宇、瑪格麗特·麥克勞林

(Margaret McLaughlin)、派翠西亞·萊利 (Patricia Riley) 和凱倫·唐森 (Karen Tongson)，他們分享了各自的見解，並挑戰了我對這項研究的許多想法。在南加州大學之外，我還要感謝艾麗嘉·凱西迪 (Elija Cassidy)、陳錦榮 (John Erni)、傑西·林格 (Jessa Lingel)、裴諭新、阿斯溫·普納塔姆貝卡 (Aswin Punathambekar) 和卡拉·華莉絲 (Cara Wallis)，他們在不同場合都對我的研究、寫作和出版提出了寶貴的建議。

此外，我對以下機構提供的研究經費表示由衷的感謝：南加州大學的安納伯格傳播與新聞學院、研究院與女性主義研究中心；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安納伯格傳播學院；以及中山大學的傳播與設計學院。沒有他們的支持，我不可能前往中國完成本書的田野調查。

我要特別感謝中山大學的裴諭新，以及廣州同城 (同城青少年資源中心，簡稱GLCAC) 和親友會 (同性戀親友會，為中國性少數群體及其親友提供服務和支持的非政府組織) 的工作人員，正是在他們的幫助下，我才得以招募到參與本書研究的受訪者。另外，我在中山大學認識的研究生陳璇也自願協助了我的田野調查。

寫作和修改的過程不僅漫長，也時而孤獨。本書的一半內容來自我的博士論文。我必須感謝南加大的論文小組成員——凱特·達菲 (Cat Duffy)、米雪·福勒 (Michelle Forelle)、詹姆士·李 (James Lee；音譯)、娜塔莉·馬瑞夏 (Nathalie Maréchal)、拉菲·薩基斯安 (Raffi Sarkissian) 和莎拉·邁爾斯·韋斯特 (Sarah Myers West)——慶幸在我的寫作之旅中有他們相伴。我在南加大的其他朋友們，包括大衛·鄭 (David Jeong；音譯)、鄭民羽、梅麗娜·謝爾曼 (Melina Sherman) 和安瑞·溫澤 (Andrea Wenzel)，也傾聽了我的想法，並對本書部分章節的初稿提供了反饋意見。

我還要感謝今福桂耐心聆聽了我無數次的傾訴與初步的構想。我也很幸運得到了父母和哥哥鼓勵，無論我身在何處，他們都始終支持我的學術追求。

本書英文版的出版歸功於安德魯·施羅克 (Andrew Schrock)、幾位匿名審稿人，以及吉塔·曼納塔拉 (Gita Manaktala) 和她在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的團隊。感謝他們在我寫作本書的各個階段所給予的鼓勵和富有建設性的反饋。

最後，我要衷心感謝所有的受訪者，謝謝他們與我大方分享自己的故事，並向朋友和熟人宣傳我的研究。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故事，很遺憾我無法在本書中一一涵蓋。

本書第二章的舊版題為〈解放或規訓？對中國城市女性使用約會軟件的技術女性主義分析〉 (“Liberating or Discipling? A Techno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Use of Dating Apps Among Women in Urban China”)，收錄於2018年《傳播、文化與批判》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的第11卷第2號，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三章和第六章的部分內容來自前作〈中國約會/社交軟件陌陌的多重用法和反目的性〉 (“Multiple Uses and Anti-Purposefulness on Momo, a Chinese Dating/Social App”)，收錄於2020年《資訊、傳播與社會》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的第23卷第10號，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團出版。感謝原出版社惠允使用以上章節。